



• 社科博士文庫 •

《全唐詩》名物詞研究

• 閔艷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全唐詩》名物詞研究——

ISBN 7-80659-558-9



9 787806 595589 >

ISBN 7-80659-558-9/I·201

定價：10.00圓

本書由內蒙古師範大學學術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 閔艷 著 •

《全唐詩》名物詞研究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全唐詩》名物詞研究/閻艷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4.2

ISBN 7 - 80659 - 558 - 9

I. 全... II. 閻... III. 唐詩 - 文學研究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005055 號

責任編輯: 譚曉紅

封面設計: 李文金

《全唐詩》名物詞研究

閻艷著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 (028) 86656816

發行科電話 (028) 86662019 86660483 86658275

成都華宇電子制印有限公司照排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電話: 84123250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5.75

字數 120 千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200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 - 1350 冊

ISBN 7 - 80659 - 558 - 9/I · 201

定價: 1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緒 論

“名物”一詞首見於《周禮》，但它在各書中各篇所指并不一致，《周禮·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賈公彥疏：“此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故云‘辨其名物’。”《地官·大司徒》有：“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鄭玄注：“名物，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訓詁的對象是古代文獻，古代文獻記錄了古代社會各個方面的內容，其中涉及到各種各樣的器物，如草木鳥獸蟲魚、宮室、車服、祭祀、禮、樂、兵、農等，均是古人所謂的名物。這些名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歷史的細節，但由於時代和語言的變遷，名物也相應地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或同物而異名，或同名而異物，較之普通詞彙，名物詞更易使人產生理解上的困難，正如金人王若虛在《五經辨惑》中所說：“三代損益不同，制度名物，容有差異。”清人王中也在《述而·內篇一》中說道：“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正因為這些原因，名物訓詁從來是訓詁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它的任務是對一些專有名詞進行解釋。而解釋一個專有名詞，必須對它的名實同時進行考

察，所以這種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領域和內容，是詞源學、訓詁學、文化學與科技史學科的交叉學科。

學者們對名物的重視，早在孔子就已經開始了，他在《論語·陽虎》中提出要“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在訓詁學高度發達的漢代，漢代訓釋語詞的專書《爾雅》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考釋名物的專著，該書將語詞共分為十九類，其中十六類同《周禮》所指的“名物”相合。東漢學者劉熙的《釋名》一書將所釋語詞分為二十七類，除了“長幼”、“親屬”、“言語”、“疾病”四類語詞，其餘二十三類均是分門別類地對各種名物進行訓釋，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此後，注重名物的學者漸多，北魏劉慤的《物祖》對各種器物的製作曾作過研究，但此書久已亡佚。隋人謝昊的《物始》十卷重點探討了事物的起源與命名，惜多亡佚。隋代虞世南的《北堂書鈔》、唐代歐陽詢的《藝文類聚》、宋代李昉等編著的《太平御覽》，雖是類書，但對許多古代名物均分類羅列資料，為研究名物提供了許多詳盡的資料。宋代羅願的《爾雅翼》，在對《爾雅》進行注釋的基礎上，補充了不少新資料，對很多名物提出新的見解和看法。明代方以智的《通雅》一書資料豐富詳瞻，雖然偶有不實之詞，但作者將自己的實踐經驗與豐富的語言學訓詁學知識綜合運用，對許多名物來源進行了探討，發明頗多。明代羅願的《物原》一卷，旨在探討事源，分辨各種名物，惜內容多散佚，耿隨朝的《名物類考》是內容豐富的名物專著，全書分門別類，廣泛收羅，但其體例不夠謹嚴，引文多不標出處；名醫李時珍雖非訓詁學家，但他在《本草綱目》一書中對各種入藥名物均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尤其是對各種動植物的命名來源，李時珍的創見經常閃耀出智慧的火花。稍後戴侗的《名物考》分二十

三類綴結名詞，其缺點是羅列內容過於狹隘。到了清代，陳元龍的《格致鏡原》包羅萬物，分門別述，對於每種事物必詳究原委與名號，真正代表了我國古代名物研究的最高成就。

此外，古代致力於治經的學者也多注重名物訓詁，漢代毛亨注經的過程中訓詁與名物并重，為我們留下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三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對《詩經》中的動植物作出了詳細的考辨，後世《詩經》名物訓詁多以此為宗；宋代蔡卞等所著《詩學名物解》探求《詩經》中草木鳥獸蟲魚等物的源流，長於徵引，但因其解常曲從《字說》，所以不為人稱道。宋代的范處義《詩補傳》、嚴粲的《詩緝》對名物的考證也很有見地，元代許謙的《詩集傳名物鈔》、明朝毛晉的《毛詩陸疏廣要》、何楷的《詩經世本古義》均旁徵博引，在《詩經》名物考證方面有不少新的發現。清代，關於《詩經》名物的訓詁取得了長足進展，納蘭性德在《毛詩名物解·序》中曾說：“六經名物之多，無逾於詩者，自天文地理，宮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一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在這種學術思想帶動下，學者們對《詩經》名物訓詁用力頗勤，陳大章的《詩傳名物集覽》、徐鼎的《毛詩名物圖說》和日本人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均對《詩經》中的動植物進行了解釋，後兩部還是圖文并茂的專著，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等著作除了注釋全文，還對名物進行了考釋，並將文字、音韻、訓詁的知識融會貫通，使很多疑點煥然冰釋。

但長期以來，由於學者自身和時代的限制，加上古代考古事業不發達，出土文物少，因而從事名物訓詁的學者除了少數根據

目驗，多數是承襲師說或旁徵博引考證推測，這種缺乏實物依據的考證，存在的問題較多。相互矛盾、以訛傳訛的現象十分普遍。

19世紀末期以來，甲骨文、金文、古器物不斷地被發現，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文史學家們發現了它的巨大價值，隨之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了雙重論證的研究方法，對文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種材料，吾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自從王氏提出此見，中外學者無不推崇，而且林義光的《詩經通解》、聞一多的《詩經研究》、于省吾的《澤螺居詩經新證》、陳戌國的《詩經句義》等均先後運用了金文材料詮釋詩義，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建國以後，政府十分重視考古發掘工作，近年來考古工作也屢屢有重大發現，使得當代學者們從事名物研究工作比起古代的優勢條件更加充分了。

隨着學科發展和人們認識的不斷提高，人們對於名物的認識也在逐步加深，當代有一些學者致力於用科學方法進行名物研究，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從研究內容而言，目前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大體劃分為四類：

一是針對某類名物集中訓釋。如吳厚炎《詩經草木匯考》（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力求用現代植物學的分類法為《詩經》的草木作出科學的詮釋，著名植物學家夏緯英運用多學科交叉的方法，在《植物名釋札記》（農業出版社，1990年版）中對漢語中數百種植物的命名也作了探討，提出了很多精辟

的見解和看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二是對某一部或幾部著作中的各種名物進行訓釋。1987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錢玄先生編著的《三禮名物通釋》，是一部考釋詳細、內容扎實的樸學著作，為學者研究《儀禮》《周禮》和大小戴《禮記》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鑒，但其內容僅限於服飾、車馬、飲食、宮室四部，似嫌不足。於是在1996年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的《三禮通論》中，錢玄先生將《名物編》單列一編，將三禮中的名物歸為衣服、飲食、宮室、車馬、武備、旗幟玉瑞、樂舞、喪葬八大類進行考釋，在每一類下又分小類，對每一名物先給出自己的解釋，再列舉三禮中出現此名物記載的原文，並繪圖加以詮釋，十分形象。於此，錢玄先生仍未滿足，在1998年又出版的《三禮詞典》中，他將三禮中所有典章、制度、名物等專用詞語均立為詞目，加以詮釋，並在訓釋過程中廣泛吸收了前人和時賢的研究成果，是理解和研究三禮的必備工具書。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楊之水先生的《詩經名物新證》是當代《詩經》名物詞研究的一部扎實而有特色的力作。作者認為，傳統學者對《詩經》的研究大體上祇有講義理與重訓詁二途，“講義理者常借題發揮，而與《詩》之本身若即若離；重訓詁者或將整首詩釘釘分割，雖對一詞一事的解釋矜慎精審，但對全詩的意義却往往置之弗論”^①。今人雖擁有前人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又可以佔有兩重證據，但對《詩經》中的名物詞的性狀、指喻與詩文本身的時代背景缺乏聯繫與貫通，因而使讀者仍難理清詩旨。作者文筆細膩，用傳統訓詁的基本方法進行考釋，却涉

① 楊之水《詩經名物新證·序》第2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版。

及了廣泛的學術領域，並在書中匯集了大批嶄新的發掘資料與圖像，而且多數已經發掘者作過不同程度的辨別和考訂，作者對這些材料從容取捨，與《詩經》內容相互印證，互為表裏，使不少名物詞變成生動具體而有喻意的形象，使詩文中盤根錯節的問題渙然冰釋。但此書祇詳細講解了《詩》三百篇中的十六篇，許多篇章還未被提及，這是此書的局限所在。

臺灣文津出版社 2001 年 8 月出版了陳溫菊先生的《詩經器物考釋》，作者認為，傳統的《詩經》名物研究著作，主要集中在草木、鳥獸、蟲魚等動植物身上，而對於《詩經》器物的研究多付之闕如，因而作者在書中捨棄了動植物內容，而將《詩經》中出現的各種器物分為五大類：禮樂器、服飾器、車馬器、兵器與日用雜器。每一大類為一章，章下分節，全書共探討器物二百七十五項，解說條目二百二十二條。文中對各種器物的形制、材料、紋飾、演進歷史等內容約略介紹，並配以實物圖片加以驗證，文中的重點是闡述器物的作用與含義，並對各種器物在詩文中的地位，給予合理的安排與解釋。這部著作的優點是吸收了大量考古發現的新材料，對很多器物的特點總結得十分精煉，缺點是對各種名物的特點仍缺乏詳細的考辨與分析。

巴蜀書社 2001 年 5 月出版的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中，劉興均博士的學位論文《〈周禮〉名物詞研究》，將名物詞的研究範圍鎖定在《周禮》一書的範圍內，將抽樣研究的名物詞分為三個系統，即物類系統、詞彙意義系統、名源系統，在研究的過程中，就專書的實際情況說話，材料扎實，歸納與推理並重，系統性很強，不足之處是有些材料過於冗繁，使文章的條理性受到影響，需要進一步對材料進行加工。

三是廣泛採擷古代文獻中各種名物詞進行訓釋。恩師黃金貴教授 1995 年出版了專著《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一書，以古代文化語詞為考釋對象，在繼承傳統訓詁學的基礎上，將語言與文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新方法引入了訓詁學，不但加強了語詞的考辨的深度和廣度，而且發展和開創了新的文化語言學理論。過去名物詞的研究一直處於感性化的階段，沒有系統的理論，因而名物考證的具體操作方法也長期呈現出不確定性，而黃師的著作則一掃往日的舊局，為當代學者樹立了一種名物訓詁的典範模式。全書將文化語詞按同義詞組進行分類，每組從 2 個至 16 個不等，平均一組 5 個，先簡證其同，然後用文化語言學和系統辨考的方法，從書證、實證等方面重點訓釋諸詞的“同中之異”，全書凡 262 組，分八大物類，辨釋 1306 個文化語詞，發現並解決了詞義訓釋中不少長期存在的渾詁、偏詁、誤詁的問題，對許多文獻中有歧義的疑難語詞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該書雖未自稱是名物專著，但實際上却是一部名物研究的力作，因為文化語詞大部分主要是通過名物寄託其文化含義，因而書中多數語詞屬名物詞，書中引證廣博，資料詳備，利用了當代考古發現的各種新資料，發明甚多，是研究名物的重要著作。

華夫主編、濟南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名物大典》廣收博採，以義類聚，上起史前，下迄清末，號稱是中國古代“物態文化百科全書”，該書約九百萬字，插圖兩千幅，內容豐富，據類次列，共有 37 大類名物，每大類中再分若干中類，中類內再含若干小類。這些古代名物詞或見諸文獻記載，或見諸實物傳世，對其本稱、別稱、省稱、單稱等務求詳備，對其出處也注之詳贍，但由於其收羅像求廣泛，難免有漏收之詞，書中對各

種名物詞偏於解釋，對一些疑難名物詞則沒有進行詳細的辨考，這樣就導致對部分相近的名物詞難以作出準確的界定。

漢代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考古發現漢代的文物數量巨大，面對龐大而繁雜的漢代文物進行一次總結性的整理，其難度是不言而喻的^①，由中國歷史博物館編輯，文物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的孫機先生所著的《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是近年來第一部全面而深入地介紹中國漢代名物的奠基之作，全書按照名物的種類和用途共分 111 類，包羅了漢代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圖文對照、圖解說明的方式，對漢代出土的各種名物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十分便於查檢，不但介紹了當時中原漢民族的物質文化的發展情況，對少數民族創造的優秀物質文明也予以肯定并單列較多的篇幅加以介紹，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作者也進行了考辨，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書中引證的資料翔實弘富，深入淺出，可以幫助讀者更形象地解讀漢代文獻和理解古代文明，是研究古代名物不可缺少的一部工具書。但由於此書卷帙規模浩大，作者個人的力量有限，因此“在積累如山的漢代文物探索中，難免有顧此失彼、詳簡不一，甚至有值得商榷之處”^②。

四是一些學者從文化史的角度出發，對某一領域的專業名物與文化史的內容結合起來進行考釋。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一些學術造詣深厚的中老年學者在這個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並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農史方面，石聲漢先生《農政全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

① 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序》第 2 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 2 月版。

② 黃展岳《讀〈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原載《文物》1994 年第 5 期第 95 - 96 頁。

社，1982年版）、繆啓愉先生的《齊民要術校釋》（農業出版社，1982年版）和《東魯王氏農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鄒介正等先生《三農紀校釋》（農業出版社，1982年版）等不但是優秀的農學訓詁著作，而且可視為出色的農業語詞訓詁專著，書中對許多農業名物都作出了科學合理的考釋。鄒樹文的《中國昆蟲學史》（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運用豐富的昆蟲學知識，對許多歷史文獻中的昆蟲進行了名實相應的研究。

在軍事方面，楊泓先生的《中國古兵器論叢》198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上下兩編，對古代的甲冑、戰車、騎兵與甲騎具裝、水軍與戰船、劍、刀、弓、戟、弩、胡床、蘭錡等一系列古代的兵用器械均作了詳盡的考釋，對每一器物的考證均遵循縝密細致的原則，文獻和圖片資料十分豐富，是一部非常優秀的軍事名物研究著作。

在民族史方面，現在的通史和綜合性詞典及民族史詞典、論著中都會涉及到對名物的考證，何光岳先生結合文獻和考古實物的研究材料，在《漢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商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周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中，作者以語言貫通文字、音韻、訓詁，集中考釋了歷來有歧義的疑難名物，是一部可讀性很強的訓詁學著作，但行文中，由於作者大量地查閱並使用了各種資料文獻，缺乏系統的分析梳理，因而某些地方使讀者感到材料堆砌過多，缺乏條理。

在音樂方面，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李純一先生所著的《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雖然是從宏觀的角度論述了各種出土

的上古樂器，但書中將自己扎實豐富的樂器樂理知識與古代文獻、出土文物相結合，對中國古代的許多樂器如箏、鐸、鐃等的形態用途均作了周密的舉例和考證，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專業資料，是一部相當有功力的著作。

此外，一些專業期刊雜誌也經常發表訓詁與文獻研究的論文，如《醫古文知識》經常發表醫學文獻中的研究之作；《中國烹飪》專門開辟“烹文煮史”欄目，對古代飲食文化中的名物研究論文常在此發表；《民族語文》及各民院的學報，也常發表民族史專業名物研究的論文；《農業考古》是研究古代農業各種問題的專刊，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名物。此外，刑法、宗教、體育、方術等也都有專科詞典及專業文獻的注釋，這些文化史研究中都離不開對名物詞的正確訓釋。

從目前的情況看，學者們在名物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重要的進步，而且在已取得的成果中，許多學者已自覺地運用了二重證據法，但從目前辭書研究的質量和文獻名物研究水平來看，與其他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相比，仍有不少搞名物訓詁的學者沿襲着從文獻到文獻的考證，對考古資料的重視還不夠。實際上，出土文物為記載文獻上的名物及其訓詁提供了可靠的參照實物，為匡補、考證、校勘提供了第一手資料。黃金貴教授早就提出，豐富的文獻資料和考古文物的有機結合，不但能體現時代優勢，也是當今名物語詞的訓釋能夠超越傳統名物訓詁的重要保證。如我國的傳統食品“豆腐”是何人何時發明的，古人多將發明權授予西漢的淮南王劉安，但劉安挂名主編的《淮南子》中沒有提到研製豆腐的記載，北宋以前的其他文獻中對此也無記載，於是現代學者們對此說產生懷疑，重新界定豆腐應起源於唐五代時期，但現

代的考古發現又將人們的視點拉回淮南王時代，1968年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發現附有特大青銅漏斗和承接容器的花崗岩石磨，這是迄今最早的石磨，研究者們認為這是用於磨豆漿、麥漿時使用的工具。劉勝僅比劉安晚死十多年，可見淮南王時代確已有了豆腐，這就說明傳說是有一定的依據的。更為有利的證據是在河南密縣打虎亭1號漢墓東漢畫像石《豆腐作坊圖》中，有一方豆腐作坊圖，上面畫一小型水磨和浸豆、燒煮等製豆腐的基本流程，這樣豆腐始於漢代就成為定論^①。

再如關於“耦犁”的問題，“耦犁”的使用曾使漢代的糧食畝產量成倍地增長，對我國以後的農業發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由於《漢書·食貨志》中關於耦犁的文字記載過於簡單，給後人的研究造成重重困難。“耦”為何意，兩頭牛的結構如何，拉了幾張犁，三人如何分工，學者們意見紛紜。但隨着漢代畫像石的發現，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較明確的答案。江蘇睢寧雙溝東漢畫像石牛耕圖和陝西米脂東漢畫像石牛耕圖，都是二牛抬杠式的犁耕法，這無疑就是“耦犁”。的確，古代的畫像如同一面鏡子，真實地映出古代社會的真實生活，正如已故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在《秦漢史》中說：“我以為除了古人的遺物以外，再沒有一種史料比繪畫雕刻更能反映出歷史上的社會之具體的形象。”^②考古出土的豐富多彩的畫像，為我們更好地進行訓詁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與如火如荼的文學相比，對唐詩的名物研究一直比較生僻，

①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語考論》第67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② 翦伯贊《秦漢史·序》第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5月第二版。

儘管許多古代的筆記、雜著和訓詁著作均對唐詩中的名物有過解釋，但總體來看，目前還未見一部有規模、有系統的唐詩名物訓詁著作。而對唐詩名物的解析，直接關係着人們對唐詩的正確理解與否，因此對唐詩的名物研究工作是有意義的。但因學力淺薄和時間緊迫的限制，對《全唐詩》中所有名物在兩年的時間內進行集中而全面的訓釋幾乎是不可能的，本課題試圖用語言與文化相結合的方法，初步對唐詩中少量有疑問的名物詞進行系統的研究整理，也算是一個粗淺的摸底工作，在本課題的進行過程中，盡量利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將名物詞的研究與語言、文化、考古、文獻等學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同時參閱時賢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具體的研究中，嚴格遵循語言學與文化史結合的系統研究方法，也即從漢語史與文化史共同的需求出發，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向對名物詞進行研究，一方面注意到其在唐代文獻中的含義，另一方面由於唐詩雖在許多詩句中涉及了名物詞，但限於篇幅，未能細致地反映名物詞的具體形制與功用，因此在訓釋過程中以唐代文獻資料為基礎論證其語言、文化義的同時，結合先秦到明清的通代文獻，力求勾勒出名物的命名、產生、發展、功用的全貌。當然，這種微觀的研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但這種研究對於唐詩本身的解讀與古代名物研究都應該還是有一定意義的。

學術研究是沒有止境的，新的考古材料和新的資料會不斷地發現，名物研究必然會逐步走向深入，由於學殖不深，學力淺薄，拙文的謬誤和闕失之處必不在少數，期待方家的撥冗指正。

目 錄

緒論·····	(1)
碓·····	(1)
俎·····	(7)
搗衣·····	(12)
甌·····	(19)
璋·····	(24)
琮·····	(29)
節·····	(35)
榮戟與門戟·····	(42)
蹶張·····	(48)
鉞·····	(55)
手戟·····	(62)
拔河·····	(65)
秋千·····	(69)
蹴鞠與馬球·····	(74)
香囊·····	(95)